

“孙悟空”怎么翻译给外国人? 翻译古诗如何保持原有韵味? 在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中,总是少不了翻译这个“中间人”。而在翻译的过程中,也有一些令人莞尔的故事——

领导人身边那些“中间人”的故事

核心提示

11月11日晚,北京中南海瀛台,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边走边聊。两位元首身侧各自伴随一位“重要人物”——翻译。
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外事活动,总是有翻译这样的“中间人”。他们很少被关注,但其作用非常重要。



上世纪50年代,范承祚(右二)在外事活动中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翻译。

“毛主席没有催促我,而是点燃一支香烟,静静地等我”

1957年5月初,作为中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,范承祚被提前调出担任外事翻译,陪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访华。“这是我国在高层外交场合首次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汉语。”范承祚说。

1957年5月12日,旭日初升之际,范承祚接到通知:“今天,毛泽东主席要接见阿议会代表团,你任翻译。”听到这一消息,范承祚既欢欣又紧张。

在中南海丰泽园,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。其间,毛泽东不时注视着范承祚。他发现,译员是陌生的,译员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。忽然,他转身问范承祚:“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?”显然,这位对于俄语、英语乃至法语都比较熟悉的开国领袖,对范承祚讲的“新鲜语言”产生了兴趣。范承祚答道:“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。”毛泽东又好奇地问:“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?”范承祚指着位于上座的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,再次报告:“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。”毛泽东听后很高兴,郑重地向马尔科说:“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,中阿关系不断升温,范承祚为毛泽东做翻译的任务随之增多。给毛泽东当翻译,有难亦有易。最初碰到的“难”是因为在伟人面前感到紧张,导致“肚里有,嘴里倒不出”。另一“难”是,毛泽东谈话严谨,有时会引经据典,译起来不容易。

谈到“易”,毛泽东曾两次帮范承祚解决难题。1957年,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,“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,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,不在乎玉皇大帝。”听到这段话,范承祚愣了一下,不知如何翻译才好。他对毛泽东说,翻译“孙悟空”,我没有把握。毛泽东微笑着为他做了一个注解:“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,足智多

谋、力大无比,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。”就这样,毛泽东帮范承祚解了围。

还有一次,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,引用了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的诗句,形容两国关系。这次,范承祚不是不会译,而是要争取译好。大概停顿了30秒,他才译出。

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听完后,气氛顿时异常热烈。见此情景,毛泽东好奇地看着他。范承祚说:“因为您引用的是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,我不敢只把意思译出来,而是花了一点时间,用了诗的韵味,效果似乎不错。”对此,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认可。迄今,范承祚还记得那几十秒的情形:“主席没有催促我,而是擦一根火柴,点燃一支香烟,静静地等我。”

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被周总理当场批评

1962年,31岁的过家鼎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,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。

周恩来听得懂英文,常常会有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,有的翻译第一次为周恩来工作甚至晕倒。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,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,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。“周总理向外交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‘居士’,我就愣住了,译不出来。”周恩来当场给过家鼎介绍了什么叫“居士”,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。翻译结束后,领导告诉他,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,就是说了一句“知识面窄了一点”。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,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,不能单纯学习语文知识。

这以后,过家鼎才慢慢了解周总理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,在和外宾说话时,他基本上不酝酿下一句话,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,“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,看翻译是否准确”。章章之说她帮总理翻译,也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当场被他批评,“怎么不懂这些? 要加强学习了。”

周恩来常考翻译,经常会在会前讨论哪个词怎么翻,有时顺便把今天要谈的主题事先通报给翻译,让大家心里有数,“要求是很严格,但是他很尊重人,始终把我们当同志来对待。”周恩来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,过家鼎还清晰记得当时各国翻译的不同待遇:许多国家的翻译是雇员身份,宴会上不入席,一直像招待员一样站着,有时要奔走传话。有一些国家的随从甚至跪着服务,而周恩来都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,在出席宴会时,要求他们坐在身边。出访亚非十四国时,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,不给翻译安排席位。“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,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。”在当时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,冀朝铸和过家鼎分别坐在周恩来和陈毅身边,对面全是皇室成员。那场面过家鼎一直记得清晰,“看得出对方很吃惊,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”。

邓小平在宴席中做了“暂停”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

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。

施燕华说,当时觉得自己英文还不错,在学校也一直是优秀生,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

认识到自己的不足:1965年底,巴基斯坦总统访问中国时,她翻译了一个国宴菜单。到了宴会厅,有一道菜端上来时,巴基斯坦总统就笑了。施燕华说,当时她还在想对方笑什么?“后来我才发现里面有一道菜叫罐焖鸭子,我把它翻译成了‘受伤的鸭子’。”

施燕华回忆说,当时她的一位老师看到后就问她为什么这个鸭子受伤了?她感到无地自容,从此之后对外交翻译有了新的认识,“必须非常认真,一字不差。”

一次,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,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,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,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。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,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“暂停”的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。

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,由于交谈甚欢,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,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“Goodbye”。在翻译高志凯印象中,这是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。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,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“再见”—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,邓小平扭过头来,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“再见”。场面十分有趣。

邓小平说的是“四川普通话”,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了,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:在四川话里,四、十不分,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,施燕华一般用猜。“如果我觉得是四,就说着‘四’,同时伸出四个指头,如果不对,他就会说‘不对,是十’。”

“实际上,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,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。”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介绍,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,如来访元首的背景、国家的背景、来访的目的,中方的基本立场等。另外一项,则是词汇的准备。而且,“台前”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,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。

还在翻译室的时候,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,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。“比如李先念说过的‘甜酸苦辣都尝过’,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?”一般的做法,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,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。所谓“标准答案”出来后,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。

(据《解放日报》、《现代快报》)

“挑肥拣瘦”——原为太学博士挑羊

成语“挑肥拣瘦”的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——太学。

有一年腊月三十,光武帝刘秀赏赐给太学博士每人一只羊。等羊群被赶到太学的大院里,问题出现了:每只羊大小不等,肥瘦不一,如何发放才算合理呢?大家七嘴八舌,议论纷纷。这时,博士甄宇站出来,笑了笑说:“不用争论了,我们要为人师表,不能挑肥拣瘦,斤斤计较,我先牵一只羊回家了。”说完,他把最小最瘦的羊牵走了。这下,大家不再争论了,你让我让,各自牵上一只羊回家去了。

这段“让羊”的佳话很快就传开了。以后,如果谁斤斤计较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或事情做,就会被批评为挑肥拣瘦。

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)

黄色信号灯——由中国人胡汝鼎提议设置

最近热议的“抢黄灯”引起人们的好奇:黄灯到底是谁发明的?其实发明黄灯的是中国人胡汝鼎。

胡汝鼎20岁时去了美国,在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。那时汽车发明时间不长,交通指示灯只有红绿两种颜色。1927年的一天,他看到车行

红灯亮,正要横穿马路时,一辆汽车呼地擦身而过,吓了他一身冷汗。他反复琢磨,终于想到在红、绿灯中间加个黄色信号灯,提醒人们注意危险。他向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得到了公司高层的首肯。

(摘自《京华时报》)

古代的医师考核——收红包可判充军

古代对从医者的考核,由官府专门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,他们的职称分别为医生、府、史、徒。这里说的“医生”与后世泛指给人治病的医生不同,而是管理医学领域的高级官员。

唐代设“太医署”,清代设“太医院”。其职责为“掌医之政令,聚诸医(即各种药物)以供医事”。到了年终,要对登记在册的从医者进行严格考核,并决定他们的俸禄待遇。考核的主要依据是从医者治疗病人的存活率。当时规定,凡经从医者诊治治愈而死亡的,从医者必须及时写出详细死因,年底上报,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认真仔细审核。

宋代,杭州有一医院名“安济坊”,它是这样考核所辖从医者的:每年治疗10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奖度牒一道;每年治疗5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赏钱20贯;每年治疗1000人左右,十全九的,则有特别的奖。与此同时,管理“安济坊”的僧人,如三年内治愈1000人的,赐予紫衣和祠部牒一道;凡从医者如以无病者冒充或杜撰病人而骗取钱米的,则给杖一百。

再有,如有从医者收取病人钱米或银两的,一经查实,轻者给杖一百,取消全年俸禄,并勾销从医资格,重者则充军劳役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她是位云南籍寡妇,善画花鸟,被选送入宫为慈禧太后代笔,免跪拜,吃六品俸——慈禧御用代笔缪嘉惠

齐白石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写道,1903年他在西安结识陕西布政使、诗人樊增祥(字樊山),“他正月也要进京,慈禧太后喜欢绘画,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,给太后代笔,吃的是六品俸,他可以在太后面前奉养我,也许能弄个六七品的官衔。”齐白石一生不涉官场,自然是婉辞了。

慈禧太后是个颇好风雅的人,闲时喜欢练字习画,“怡情翰墨,学绘花卉,尝以所作,赐宴俸大臣,久之,思得一二代笔妇人,仍令各省督抚觅之”(《喻血轮·销情楼杂记·女画家缪太太》)。这位名嘉惠字素筠的女性,云南人,其夫曾在四川做官,后病死,乃重归故里。她善画花鸟,毛笔字亦写得楚楚动人,于是被选送入宫,为慈禧太后代笔。“慈禧召见,面试之,大喜,置诸左右,朝夕不离,并免其跪拜,月给俸二百金(即二百两白银),于是缪氏遂成为慈禧之清客,外间多以缪太称之。”

慈禧太后为拉拢一些亲近大臣,常恩赐一些书画作品,得之者视为殊荣。其实,此中的大部分作品都系缪嘉惠代笔。

在慈禧太后六十寿庆时,她命缪嘉惠着凤冠霞帔穿行于王公眷属之间,满族妇女很少见到这种服饰,“皆为之大笑失声,慈禧亦为之大乐”。

野莽曾写过一部《禁宫画像——美国女画家卡尔宫廷闻见录》的书,由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。

此中有“宫廷女画师”、“教画”、“寡妇缪嘉惠”等几章,说缪嘉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,长大后又嫁到了另一个官宦之家,温柔贤淑,知书谙礼,会弹古琴、擅长书画,“丈夫更是把她当秘书,经常从任上带着文稿回家让她抄

写,有时还让她起草文章公案”。丈夫病逝后,她带着孩子回到昆明,“先是弹琴卖艺,勉强糊口,后来写字卖画,以此为生”。

进宫后,缪嘉惠深知“老佛爷”不是一般的学生,她不能以老师自居,同时,又得让老佛爷的字画有所进步,否则会招致不测之祸。慈禧太后喜欢画长寿的仙鹤,她就得体地施教,并让其不觉得有“教”的味道。总之是处处小心,于是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她发觉慈禧太后很欣赏唐代的武则天,于是画《金轮皇帝宸冠临朝图》以献,让“老佛爷”极为高兴,“当即放下画轴,用手在缪嘉惠女士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这当众一摸,使缪嘉惠女士在宫中的地位一升百丈。上至皇后嫔妃,下至太监宫女,见面都称她为缪太太、缪先生、缪师傅”。

慈禧太后死后,缪嘉惠还在隆裕太后身边待了一段日子。因隆裕太后对书画全无兴趣,最终让她出宫回到昆明。好在当时她的名声已显,求买字画的人川流不息,可以生活得很珍贵。她买了大宅院,“又用卖画的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,然后在77岁的时候,静静地长逝于她满壁书画的卧室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和缪嘉惠同时进宫的还有另外一位女画家王韶,号冬青,浙江人。“因为王韶是艺术家的气质,教画就教画,就真把‘老佛爷’当作她的学生,每天布置几张作业,还在‘老佛爷’的画上打分写评语,什么有进步没进步的,弄得‘老佛爷’很不高兴”。王韶也觉得兴味索然,两年后请求放归,“老佛爷”自然首肯。清高的王韶,出宫后过得很潦倒,贫困抑郁,“就自杀了,死前把画的画儿全烧了。”
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

缪嘉惠画作

“挑肥拣瘦”——原为太学博士挑羊

成语“挑肥拣瘦”的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——太学。

有一年腊月三十,光武帝刘秀赏赐给太学博士每人一只羊。等羊群被赶到太学的大院里,问题出现了:每只羊大小不等,肥瘦不一,如何发放才算合理呢?大家七嘴八舌,议论纷纷。这时,博士甄宇站出来,笑了笑说:“不用争论了,我们要为人师表,不能挑肥拣瘦,斤斤计较,我先牵一只羊回家了。”说完,他把最小最瘦的羊牵走了。这下,大家不再争论了,你让我让,各自牵上一只羊回家去了。

这段“让羊”的佳话很快就传开了。以后,如果谁斤斤计较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或事情做,就会被批评为挑肥拣瘦。

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)

黄色信号灯——由中国人胡汝鼎提议设置

最近热议的“抢黄灯”引起人们的好奇:黄灯到底是谁发明的?其实发明黄灯的是中国人胡汝鼎。

胡汝鼎20岁时去了美国,在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。那时汽车发明时间不长,交通指示灯只有红绿两种颜色。1927年的一天,他看到车行

红灯亮,正要横穿马路时,一辆汽车呼地擦身而过,吓了他一身冷汗。他反复琢磨,终于想到在红、绿灯中间加个黄色信号灯,提醒人们注意危险。他向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得到了公司高层的首肯。

(摘自《京华时报》)

古代的医师考核——收红包可判充军

古代对从医者的考核,由官府专门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,他们的职称分别为医生、府、史、徒。这里说的“医生”与后世泛指给人治病的医生不同,而是管理医学领域的高级官员。

唐代设“太医署”,清代设“太医院”。其职责为“掌医之政令,聚诸医(即各种药物)以供医事”。到了年终,要对登记在册的从医者进行严格考核,并决定他们的俸禄待遇。考核的主要依据是从医者治疗病人的存活率。当时规定,凡经从医者诊治治愈而死亡的,从医者必须及时写出详细死因,年底上报,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认真仔细审核。

宋代,杭州有一医院名“安济坊”,它是这样考核所辖从医者的:每年治疗10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奖度牒一道;每年治疗5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赏钱20贯;每年治疗1000人左右,十全九的,则有特别的奖。与此同时,管理“安济坊”的僧人,如三年内治愈1000人的,赐予紫衣和祠部牒一道;凡从医者如以无病者冒充或杜撰病人而骗取钱米的,则给杖一百。

再有,如有从医者收取病人钱米或银两的,一经查实,轻者给杖一百,取消全年俸禄,并勾销从医资格,重者则充军劳役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她是位云南籍寡妇,善画花鸟,被选送入宫为慈禧太后代笔,免跪拜,吃六品俸——慈禧御用代笔缪嘉惠

齐白石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写道,1903年他在西安结识陕西布政使、诗人樊增祥(字樊山),“他正月也要进京,慈禧太后喜欢绘画,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,给太后代笔,吃的是六品俸,他可以在太后面前奉养我,也许能弄个六七品的官衔。”齐白石一生不涉官场,自然是婉辞了。

慈禧太后是个颇好风雅的人,闲时喜欢练字习画,“怡情翰墨,学绘花卉,尝以所作,赐宴俸大臣,久之,思得一二代笔妇人,仍令各省督抚觅之”(《喻血轮·销情楼杂记·女画家缪太太》)。这位名嘉惠字素筠的女性,云南人,其夫曾在四川做官,后病死,乃重归故里。她善画花鸟,毛笔字亦写得楚楚动人,于是被选送入宫,为慈禧太后代笔。“慈禧召见,面试之,大喜,置诸左右,朝夕不离,并免其跪拜,月给俸二百金(即二百两白银),于是缪氏遂成为慈禧之清客,外间多以缪太称之。”

慈禧太后为拉拢一些亲近大臣,常恩赐一些书画作品,得之者视为殊荣。其实,此中的大部分作品都系缪嘉惠代笔。

在慈禧太后六十寿庆时,她命缪嘉惠着凤冠霞帔穿行于王公眷属之间,满族妇女很少见到这种服饰,“皆为之大笑失声,慈禧亦为之大乐”。

野莽曾写过一部《禁宫画像——美国女画家卡尔宫廷闻见录》的书,由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。

此中有“宫廷女画师”、“教画”、“寡妇缪嘉惠”等几章,说缪嘉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,长大后又嫁到了另一个官宦之家,温柔贤淑,知书谙礼,会弹古琴、擅长书画,“丈夫更是把她当秘书,经常从任上带着文稿回家让她抄

写,有时还让她起草文章公案”。丈夫病逝后,她带着孩子回到昆明,“先是弹琴卖艺,勉强糊口,后来写字卖画,以此为生”。

进宫后,缪嘉惠深知“老佛爷”不是一般的学生,她不能以老师自居,同时,又得让老佛爷的字画有所进步,否则会招致不测之祸。慈禧太后喜欢画长寿的仙鹤,她就得体地施教,并让其不觉得有“教”的味道。总之是处处小心,于是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她发觉慈禧太后很欣赏唐代的武则天,于是画《金轮皇帝宸冠临朝图》以献,让“老佛爷”极为高兴,“当即放下画轴,用手在缪嘉惠女士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这当众一摸,使缪嘉惠女士在宫中的地位一升百丈。上至皇后嫔妃,下至太监宫女,见面都称她为缪太太、缪先生、缪师傅”。

慈禧太后死后,缪嘉惠还在隆裕太后身边待了一段日子。因隆裕太后对书画全无兴趣,最终让她出宫回到昆明。好在当时她的名声已显,求买字画的人川流不息,可以生活得很珍贵。她买了大宅院,“又用卖画的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,然后在77岁的时候,静静地长逝于她满壁书画的卧室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和缪嘉惠同时进宫的还有另外一位女画家王韶,号冬青,浙江人。“因为王韶是艺术家的气质,教画就教画,就真把‘老佛爷’当作她的学生,每天布置几张作业,还在‘老佛爷’的画上打分写评语,什么有进步没进步的,弄得‘老佛爷’很不高兴”。王韶也觉得兴味索然,两年后请求放归,“老佛爷”自然首肯。清高的王韶,出宫后过得很潦倒,贫困抑郁,“就自杀了,死前把画的画儿全烧了。”
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

缪嘉惠画作

“挑肥拣瘦”——原为太学博士挑羊

成语“挑肥拣瘦”的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——太学。

有一年腊月三十,光武帝刘秀赏赐给太学博士每人一只羊。等羊群被赶到太学的大院里,问题出现了:每只羊大小不等,肥瘦不一,如何发放才算合理呢?大家七嘴八舌,议论纷纷。这时,博士甄宇站出来,笑了笑说:“不用争论了,我们要为人师表,不能挑肥拣瘦,斤斤计较,我先牵一只羊回家了。”说完,他把最小最瘦的羊牵走了。这下,大家不再争论了,你让我让,各自牵上一只羊回家去了。

这段“让羊”的佳话很快就传开了。以后,如果谁斤斤计较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或事情做,就会被批评为挑肥拣瘦。

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)

黄色信号灯——由中国人胡汝鼎提议设置

最近热议的“抢黄灯”引起人们的好奇:黄灯到底是谁发明的?其实发明黄灯的是中国人胡汝鼎。

胡汝鼎20岁时去了美国,在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。那时汽车发明时间不长,交通指示灯只有红绿两种颜色。1927年的一天,他看到车行

红灯亮,正要横穿马路时,一辆汽车呼地擦身而过,吓了他一身冷汗。他反复琢磨,终于想到在红、绿灯中间加个黄色信号灯,提醒人们注意危险。他向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得到了公司高层的首肯。

(摘自《京华时报》)

古代的医师考核——收红包可判充军

古代对从医者的考核,由官府专门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,他们的职称分别为医生、府、史、徒。这里说的“医生”与后世泛指给人治病的医生不同,而是管理医学领域的高级官员。

唐代设“太医署”,清代设“太医院”。其职责为“掌医之政令,聚诸医(即各种药物)以供医事”。到了年终,要对登记在册的从医者进行严格考核,并决定他们的俸禄待遇。考核的主要依据是从医者治疗病人的存活率。当时规定,凡经从医者诊治治愈而死亡的,从医者必须及时写出详细死因,年底上报,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认真仔细审核。

宋代,杭州有一医院名“安济坊”,它是这样考核所辖从医者的:每年治疗10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奖度牒一道;每年治疗5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赏钱20贯;每年治疗1000人左右,十全九的,则有特别的奖。与此同时,管理“安济坊”的僧人,如三年内治愈1000人的,赐予紫衣和祠部牒一道;凡从医者如以无病者冒充或杜撰病人而骗取钱米的,则给杖一百。

再有,如有从医者收取病人钱米或银两的,一经查实,轻者给杖一百,取消全年俸禄,并勾销从医资格,重者则充军劳役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她是位云南籍寡妇,善画花鸟,被选送入宫为慈禧太后代笔,免跪拜,吃六品俸——慈禧御用代笔缪嘉惠

齐白石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写道,1903年他在西安结识陕西布政使、诗人樊增祥(字樊山),“他正月也要进京,慈禧太后喜欢绘画,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,给太后代笔,吃的是六品俸,他可以在太后面前奉养我,也许能弄个六七品的官衔。”齐白石一生不涉官场,自然是婉辞了。

慈禧太后是个颇好风雅的人,闲时喜欢练字习画,“怡情翰墨,学绘花卉,尝以所作,赐宴俸大臣,久之,思得一二代笔妇人,仍令各省督抚觅之”(《喻血轮·销情楼杂记·女画家缪太太》)。这位名嘉惠字素筠的女性,云南人,其夫曾在四川做官,后病死,乃重归故里。她善画花鸟,毛笔字亦写得楚楚动人,于是被选送入宫,为慈禧太后代笔。“慈禧召见,面试之,大喜,置诸左右,朝夕不离,并免其跪拜,月给俸二百金(即二百两白银),于是缪氏遂成为慈禧之清客,外间多以缪太称之。”

慈禧太后为拉拢一些亲近大臣,常恩赐一些书画作品,得之者视为殊荣。其实,此中的大部分作品都系缪嘉惠代笔。

在慈禧太后六十寿庆时,她命缪嘉惠着凤冠霞帔穿行于王公眷属之间,满族妇女很少见到这种服饰,“皆为之大笑失声,慈禧亦为之大乐”。

野莽曾写过一部《禁宫画像——美国女画家卡尔宫廷闻见录》的书,由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。

此中有“宫廷女画师”、“教画”、“寡妇缪嘉惠”等几章,说缪嘉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,长大后又嫁到了另一个官宦之家,温柔贤淑,知书谙礼,会弹古琴、擅长书画,“丈夫更是把她当秘书,经常从任上带着文稿回家让她抄

写,有时还让她起草文章公案”。丈夫病逝后,她带着孩子回到昆明,“先是弹琴卖艺,勉强糊口,后来写字卖画,以此为生”。

进宫后,缪嘉惠深知“老佛爷”不是一般的学生,她不能以老师自居,同时,又得让老佛爷的字画有所进步,否则会招致不测之祸。慈禧太后喜欢画长寿的仙鹤,她就得体地施教,并让其不觉得有“教”的味道。总之是处处小心,于是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她发觉慈禧太后很欣赏唐代的武则天,于是画《金轮皇帝宸冠临朝图》以献,让“老佛爷”极为高兴,“当即放下画轴,用手在缪嘉惠女士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这当众一摸,使缪嘉惠女士在宫中的地位一升百丈。上至皇后嫔妃,下至太监宫女,见面都称她为缪太太、缪先生、缪师傅”。

慈禧太后死后,缪嘉惠还在隆裕太后身边待了一段日子。因隆裕太后对书画全无兴趣,最终让她出宫回到昆明。好在当时她的名声已显,求买字画的人川流不息,可以生活得很珍贵。她买了大宅院,“又用卖画的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,然后在77岁的时候,静静地长逝于她满壁书画的卧室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和缪嘉惠同时进宫的还有另外一位女画家王韶,号冬青,浙江人。“因为王韶是艺术家的气质,教画就教画,就真把‘老佛爷’当作她的学生,每天布置几张作业,还在‘老佛爷’的画上打分写评语,什么有进步没进步的,弄得‘老佛爷’很不高兴”。王韶也觉得兴味索然,两年后请求放归,“老佛爷”自然首肯。清高的王韶,出宫后过得很潦倒,贫困抑郁,“就自杀了,死前把画的画儿全烧了。”
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

缪嘉惠画作

“挑肥拣瘦”——原为太学博士挑羊

成语“挑肥拣瘦”的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——太学。

有一年腊月三十,光武帝刘秀赏赐给太学博士每人一只羊。等羊群被赶到太学的大院里,问题出现了:每只羊大小不等,肥瘦不一,如何发放才算合理呢?大家七嘴八舌,议论纷纷。这时,博士甄宇站出来,笑了笑说:“不用争论了,我们要为人师表,不能挑肥拣瘦,斤斤计较,我先牵一只羊回家了。”说完,他把最小最瘦的羊牵走了。这下,大家不再争论了,你让我让,各自牵上一只羊回家去了。

这段“让羊”的佳话很快就传开了。以后,如果谁斤斤计较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或事情做,就会被批评为挑肥拣瘦。

(摘自《百科知识》)

黄色信号灯——由中国人胡汝鼎提议设置

最近热议的“抢黄灯”引起人们的好奇:黄灯到底是谁发明的?其实发明黄灯的是中国人胡汝鼎。

胡汝鼎20岁时去了美国,在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。那时汽车发明时间不长,交通指示灯只有红绿两种颜色。1927年的一天,他看到车行

红灯亮,正要横穿马路时,一辆汽车呼地擦身而过,吓了他一身冷汗。他反复琢磨,终于想到在红、绿灯中间加个黄色信号灯,提醒人们注意危险。他向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建议,得到了公司高层的首肯。

(摘自《京华时报》)

古代的医师考核——收红包可判充军

古代对从医者的考核,由官府专门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,他们的职称分别为医生、府、史、徒。这里说的“医生”与后世泛指给人治病的医生不同,而是管理医学领域的高级官员。

唐代设“太医署”,清代设“太医院”。其职责为“掌医之政令,聚诸医(即各种药物)以供医事”。到了年终,要对登记在册的从医者进行严格考核,并决定他们的俸禄待遇。考核的主要依据是从医者治疗病人的存活率。当时规定,凡经从医者诊治治愈而死亡的,从医者必须及时写出详细死因,年底上报,掌管医事的官员进行认真仔细审核。

宋代,杭州有一医院名“安济坊”,它是这样考核所辖从医者的:每年治疗10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奖度牒一道;每年治疗500人以上,十全八的,赏钱20贯;每年治疗1000人左右,十全九的,则有特别的奖。与此同时,管理“安济坊”的僧人,如三年内治愈1000人的,赐予紫衣和祠部牒一道;凡从医者如以无病者冒充或杜撰病人而骗取钱米的,则给杖一百。

再有,如有从医者收取病人钱米或银两的,一经查实,轻者给杖一百,取消全年俸禄,并勾销从医资格,重者则充军劳役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她是位云南籍寡妇,善画花鸟,被选送入宫为慈禧太后代笔,免跪拜,吃六品俸——慈禧御用代笔缪嘉惠

齐白石在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写道,1903年他在西安结识陕西布政使、诗人樊增祥(字樊山),“他正月也要进京,慈禧太后喜欢绘画,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,给太后代笔,吃的是六品俸,他可以在太后面前奉养我,也许能弄个六七品的官衔。”齐白石一生不涉官场,自然是婉辞了。

慈禧太后是个颇好风雅的人,闲时喜欢练字习画,“怡情翰墨,学绘花卉,尝以所作,赐宴俸大臣,久之,思得一二代笔妇人,仍令各省督抚觅之”(《喻血轮·销情楼杂记·女画家缪太太》)。这位名嘉惠字素筠的女性,云南人,其夫曾在四川做官,后病死,乃重归故里。她善画花鸟,毛笔字亦写得楚楚动人,于是被选送入宫,为慈禧太后代笔。“慈禧召见,面试之,大喜,置诸